

作家作品研究的要求

第一节 作家作品研究方法漫谈

一、导 论

这门课叫“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不是知识的介绍，而是研究方法的指导。学术研究，对我们本科生来说，还只是刚接触，所以，一些方法的指导是必要的。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两大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古代中国是一个重“道”、重“体”、重“形而上”的国度，看重的是理论，而对理论的获得过程并不关心。五四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大批学者从海外归来，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方法，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开启了中国近代学术现代化进程，比如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他们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胡适先生是其代表人物，许冠三有段话是这样说的：

“在二十世纪的名学人中，胡适（1891—1962）是最先由方法自觉的一位。远在求学时期，他已知以西洋传统逻辑作批判工具，并发下宏愿，要以西洋方法用于中国古籍的研究。1915—1916年间，他已意识到思维术与哲学兴衰进退的关系，接受了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暗示，相信思维方法的革新实含蕴哲学的改造与进化，于是便选定先秦名学进化史为题，写成他的博士论文。因此，在历史研究领域，他也是讲求方法的先锋。”¹

胡适另有许多谈方法的文章，如《研究国故的方法》《考证方法之来历》《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

方法的使用，可以提供一些更加有效、简捷的途径。梁启超认为做学问若得法，则事半功倍。他曾说：

“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来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²

这与傅斯年的“凡一门学科能扩充其工具的便进步，否则便退步”是同一个意思。

不过，方法的使用，要考虑学科特点。像我们的古代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还是我们老祖宗的传统考证方法，如果脱离基本的文献，那是要误入歧途的。周勋初先生对那种滥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情况，有过批判。他说：

“由于国外各种思潮的涌入，学术界也常有人介绍各种新的研究方法。一九八五年前后，提倡新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人很多，但仅仅停留在介绍与宣传上，未见研究成功的实例，结果历时不久即自行消歇。由于社会上趋新成风，学术界也相应

¹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50页。

² 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载于《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8页。

地兴起阵阵新风，经过多次折腾之后，大家也就慢慢地体会到，文史不分的传统研究方法还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欧美学者常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原型研究等方法，也有人使用，但还未见规模宏大的成功之作。这些方法适用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我国古代文学情况有别，因此使用这些外来的方法，还得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作出是否适用的结论。”³

因为中西文学有差异，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方法也必然会有差异。文学研究和研究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研究对象要求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往往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关系来确立文学研究的对象。阿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提出文学的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和观众。与研究对象相应，文学研究方法也形成了四个方面：一是作家角度，比如文艺社会学研究法、传记研究法、精神分析法、原型研究法等；二是作品角度，如符合学研究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结构与解构研究法；三是读者角度，如解释学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等；四是世界角度，如社会文化研究、后现代文艺美学研究法、新历史主义研究法等。我们这门课程，依然会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作为重点来讲，然后介绍一些逻辑方法，从思维上训练同学们，最后介绍一种最易于操作的传播学的方法。

接下来，谈谈进行作家作品研究所要具备的基本功。作家作品研究有三个基本功：熟读作品、熟悉史料、熟悉理论。

作品，是我们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不论是做考据还是做理论阐释，都要细读作品。西方有所谓“细读文本”的方法，是很适用、很必要的。“细读”作品文本，是做文学研究必备的基本素质。你不熟悉作品，分析作家的艺术个性就无从谈起。对作品没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不能自我判断作品的优劣好坏，就无法评判作家的贡献和地位。大家原来读文学史，脑海里填满的是中国文学史的各种现象、流派，有哪些作家，这些作家艺术上有什么特点、内容上有何特点、在文学史上有何地位等知识。当然，这些知识是要了解，尤其是应考时需要。但要写论文，就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要发现问题，就要熟读作品，多读作品。搞作家研究，读选本不行，要读熟、读透作家的全部作品。通过阅读作品，让这个作家在你心中活起来，能想象他的音容笑貌，能感受他的喜怒哀乐，能走进他的心灵世界，能把握他的精神个性。通过对一个作家的解剖，逐步掌握分析作家作品的方法和途径。

熟悉史料，也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我们研究古典文学，需要穿越历史的屏障，进入古代作家的生活环境和创作语境。我们读当代的小说、戏曲，读完后能立刻就明白它讲的什么背景，作品中的人物为什么会这样想、这么说、这么做，并且能够感同身受。而读古典的作品，可能我们知道作者写的是什么，但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下写出来的。而要了解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就必须熟悉相关史料文献。有同学认为，我读了《中国通史》，读了《隋唐五代史》，读了《宋代史》，就对唐宋时期的历史很熟悉了。这还远远不够。近人写的历史著作，是“第二历史”，是历史学家建构出来的历史，而不是本源的历史，不是活生生的历史，更不是我们所要了解的个体化、独特的作家生存状态史。我们要有自己心目中的历史，要自己穿越历史时空，去体会作家生存的历史环境，感受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就需要阅读原始史料，读史学原典，通过史料来还原历史。

历史原典，包括正史、野史。比如，你要了解宋南渡时期作家的生存状态、文化环境，至少应该读一读《宋史》《宋史纪事本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等正史著作，还应该读一读《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挥麈录》《鹤林玉露》等野史笔记。

理论，也不能忽视。作品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出发点，史料和理论是研究古代文

³ 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198页。

学的两个支撑点。没有史料，研究古代文学就失去了根基；没有理论，就没有思想活力和思维方向。仅仅是熟悉作品，掌握了史料，而没有一定的理论做指导，就难以找到分析问题的视角、方法和途径，有时甚至找不到一个学理性的概念、范畴来表述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论述问题也很难有深度和高度。读了作品，会有一些感性的体悟，如果没有理论，就难以将这些体悟从感性提升到理性，就难以将自己的感受、思考提炼成具有普适性、规律性的学术观点。理论，可以启发思维，打开思路，转换视角，提供方法。

理论，又指哪些理论呢？首先当然指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都要熟悉和了解。此外，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传播学等理论，也要留心学习。

作家作品研究有两个基本能力：考据和诠释。考据是实证性的研究，是对事实真伪的判断；诠释是理论性的分析，也可以说是价值判断。考据回答的是“是与不是”的问题；诠释回答的是“好与不好”的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或者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

二、选文

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⁴

张伯伟

每一时代的学术，皆有其自身所面对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为了解决问题，走出困境，就需要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新的理念、材料和方法。各门不同学科所面对的，往往是一些具体的问题；而由各种具体问题归结起来的共同点，就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问题，正如禅宗所说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⁵。中国学术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始于二十世纪初。如果学术之升降以百年而论的话，对于身处二十一世纪初的关心学术前途、承担学术命运的学者来讲，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思考起点。

中国的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冲击和启示下形成的。而在世界范围内的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汉学研究，尽管有从汉学（Sinology）到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转变，但说到底，也都是西方学术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当我们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以外，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外来的”。应当看到，在外来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

⁴ 张伯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载于《中国文化》2009年第2期，第107-116页。本书引用时略有改动。

⁵ 玄觉：《永嘉证道歌》，载于《大藏经》第四十八册，第396页。

启示下，中国学术曾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甚至仍然可能继续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胡适当年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而所谓“科学的方法”，其实就是西洋人做学问的方法。傅斯年 1928 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⁶他所想“借”的“几个不陈的工具”，说穿了也是西洋的方法。陈寅恪在 1934 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经以王氏为例，举出其学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三项原因，前两项都属于材料方面（地上和地下，异族和汉族），列于第三的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然而不幸的是，此后汗牛充栋的论著，其绝大部分早已不是什么“参证”，外来的观念和方法愈演愈烈为学术研究的起点（提问方式）和终点（最后结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邀请严耕望前往任教之时，钱穆的反应是：“应该讲讲，给青年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研究该如何做了。”⁷撇开个人的学术恩怨和偏见不谈，这也代表了本土知识人对于二十世纪学术方法的一种看法和意见。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正在使自身由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在经济上，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但这种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的注意和承认。那么，在学术上，中国的知识人能否提出并实践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知识生产方式呢？这，就是我所体认到的当代中国学术所面临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

……

（本书作者按：中间省去了一些内容，主要是谈前人的一些思考。有西方的异域视野，像美国保罗·柯文的《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还有一个是日本的沟口雄三，他有部书是《作为方法的中国》，这两部著作都是对西方中心说的挑战，强调了

⁶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四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 年版，第 258 页。

⁷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9 页。

中国历史以自身内部为出发点，即所谓“中国中心观”。)

因此，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命题——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用以概括十多年来我在学术上的一个努力方向，也试图对当代学术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作一个初步的回应。

……

张伯伟先生首先介绍了什么是汉文化圈。所谓汉文化圈就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而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其周边地区，如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蒙古等地区。它有四大要素，一是汉字文化，二是儒教，三是律令制，四是佛教。

然后总结了汉文化圈的方法有三个方面：

其一，文学典籍的流传。研究典籍的流传，他概括了十个方面，即从书目、史书、日记、文集、诗话、笔记、序跋、书信、印章和实物等方面来考察。他举了袁枚的《随园诗话》为例，在日本是大受欢迎，而在朝鲜则不怎么待见，中国也是毁誉参半，章学诚就曾严厉地批判。

其二，文人学士的交往。因他谈的都是中日或中韩的交往，与我们无关，故略。

其三，文化意象的嬗变。他以“骑驴”和“骑牛”两种意象为例，说明中国古代与日本的差异。驴是中国古代诗人喜爱的坐骑，中国文学史上以骑驴著称的诗人很多，以唐代而论，就有孟浩然、李白、杜甫、贾岛、李贺等。由于一些著名的骑驴故事和骑驴语录的流传，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步形成了诗人骑驴的意蕴。总括而言，不外两点。第一，驴是诗人特有的坐骑；第二，驴是诗人清高心态的象征。“骑驴”不仅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选择。在诗人的眼里，“蹇驴”往往和“骏马”相对，它象征着在野与在朝、布衣与缙绅、贫困与富贵的对立。因此，这一对立是具有政治性的。而高丽和朝鲜的诗人则偏爱骑牛。到朝鲜时代，以“骑牛”作为诗人身份的象征，并且坚持在野隐逸的立场，成为一个普遍想象。

三、延伸阅读书目

- [1] 杜松柏. 国学治学方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2] 赵敏俐. 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 [3]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台北：东方出版社，1996.
- [4] 周勋初. 当代学术研究思辨[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5] 王瑶.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6] 李浩.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 [7] 赵益. 古典研究方法导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8] 胡经之，王岳川. 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9] 金岳霖. 形式逻辑简明读本[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 [10] 赵宪章. 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 [11] 陈鸣树. 文艺学方法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四、思考与研究

1. 阅读一些文艺学方法论的著作，了解有关理论。
2.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如何开拓与创新？

3. 中国文学特征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4. 思考方法论的学习对于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5. 你认为方法论课程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第二节 古代作家作品研究读书法

一、导 论

做研究，首先得读书。但读书也要讲究方法，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那么多的作品、作家，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只能读其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做古代文学的研究，需要勤勉加方法。古人也常谈及读书法，比如朱熹就有系统的读书法，《朱子读书法》为他弟子所记，现有流传。其后元朝程端礼有《读书分年日程》，清朝徐与乔有《五经读法》等。这些都是以著作的形式系统地谈及读书方法，同时还有许多杰出的学者，都有一些零星片语表达了对读书的认识、经验或体会。古代读书法的内涵，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指导，更是某种学术思考的结果。

做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需要对相关的书籍进行有理论、有系统地学习。我们已经读了两年的汉语言文学，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是必要的，但这些文学史著作都是后人著述的，只是让我们大致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原著。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在编文学史教材时就告诫学生：“诸君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着重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着重原书。诸君假如仅仅细心的读完了一部书，如《诗经》，或《左传》，或一大家的诗，都比读完一切近年来文学史的著作好；又把楚辞的章句故训详细校读一遍，自己会有一种见解，便也用不着别人的教科书，所以文学史之用，断不是以此代替读专书，恰恰反面，乃是刺激人们去分读专书的。不过，我们虽知道专书的研究是根本功夫，而但能分读专书不知联络的人，也常常免不了‘鄙陋’，把这个名词翻成近代话，‘乡下人气’。所见不广，不知道文学因时因地的变迁和联络，就要‘坐井观天’了。”⁸傅斯年谈到了专和通的关系，通是为了专，专要有通的意识。前面我们已经学完了文学史，有了通的准备，下一阶段就是要开始专了。进行专门的研究时，要有些知识储备，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文献学的知识。文献学很重要，它是进行古代作家作品以致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称之为“助跑学”。文献学即过去说的“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程千帆先生曾说古代文学的研究应该是“希望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精密结合。要求一方面有比较深刻的美学艺术修养，其中包括创作经验在内；另一方面要有深厚的文献学知识，要懂得版本、目录，要懂得音韵训诂，还要懂得风俗、制度等”。⁹故此，程先生相当重视文献基础，现在南京大学都沿袭这个传统，给古代文学专业都开设文献学的课程。而且现在，有大量的中文工具书供大家去查阅资料，本书第二章将专门谈中文工具书的使用。

第二方面是熟读一些经典文学著作。每一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比如先秦的《诗经》《楚辞》，唐以前的文学总集——《文选》，唐代李白、杜甫的诗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明清的四大名著，这些都需要大家去熟悉。

第三方面是诸子经典和重要史书。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开出了如下书目：有《论语》《孟子》《老子》《墨子》《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资治通鉴》、

⁸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⁹ 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等。

二、选文

本节选取王兆鹏先生发表于 2001 年第 3 期《古典文学知识》上的一篇文章《读书“五法”》的重要章节，以便读者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有效地进行学习。

读书“五法”¹⁰

王兆鹏

一、比较法。

未入和刚入学术之门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困惑：读完了几本书，还是摸不着头绪，发现不了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收集材料，更谈不上去解决什么问题。遇到这种情况，不妨试一试“比较读书法”。比较的目的又有两种，一是同中求异，二是异中求同。

所谓同中求异，是就同一个专题或同一作家作品，同时找几本研究著作来阅读，看学术界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找出彼此观点的相异、相左之处。找到了相异的学术观点或结论，也就是初步发现了学术问题。两种相左的结论，如果是史实方面的问题，必有一个是错误的；如果是理解上的问题，必有一个更接近于事实。要弄清楚究竟谁是谁非，就需要找相关的材料去论证。由收集材料进而论证、解决问题，这样就可逐渐找到做学问的途径、找到做学问的“感觉”，进入做学问的“状态”。

我做学问，是从研究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当时是读大学四年级。当时为了便于掌握宋代词人的字号和生卒年，我自己编制宋代词人的字号和生卒年表，在制表过程中，比较了相关论著的记载，发现有的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等人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就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纪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

¹⁰ 王兆鹏：《读书“五法”》，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3期，第13-22页。本书引用时略有改动。

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由此而写出了本科毕业论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跟随本校曾昭眠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在曾师的指导下，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

所谓异中求同，是指读理论书籍时，要从古今中外不同的论著中寻找某一理论的支撑点或研究方法。我们这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理论的基础一开始并不很厚实，读理论著作时不容易把握其精神实质、理论体系。为了深入切实掌握一种理论方法，我常常“对读”不同的理论著作，比较其异同。我曾比较读过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书的异同，收获多多。要比较二者的异同，就要思考，思考后对原书的要义就容易记住和把握。同样的两本书，浮光掠影地各读一遍，远不如这样比较阅读的收获大。要做学问，必须熟读、精读、掌握几本“看家”的书，将这些书的理论、精神、方法深入融化到自己的思想中去，会终身受用无穷。至于哪些书该精读，哪些书可以“看家”，那就因人而异了。人的素质不同，兴趣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追求。做学问的方式不同，对于书的要求也自然不同。

二、纵横法。

研究一个作家，既要横向地阅读跟他同时的作家的文集，还要纵向地阅读他前后的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实证考据，还是进行理论分析，都须如此。比如做《张元干年谱》，仅仅依据张元干本人的文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与他同时的诗人词人的文集中挖掘资

料。与张元干同时的诗人词客有数十人，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读完。我的做法是，先“精读”与他有交游唱和者的文集，从中找出与张元干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的资料，然后再“泛读”跟他没有直接交往的诗人的文集，从中也发现了一些间接的资料。比张元干晚一辈的作家，虽然与张元干不会有直接的交往，但他们的文集中也会有诗文涉及张元干本人或其交游者的事迹。比如周必大的《益公题跋》，有关张元干及其友人生平事迹的题跋就很多；蔡戡《定斋集》中也有张元干的词集序。阅读的文集越多，掌握的资料就越丰富。同样的道理，研究五代人的生平事迹，不能不读宋初人的文集。依此类推，要研究苏轼及苏门诗人群，不能仅仅读苏门诸公的文集，还要广泛阅读苏轼身后的如南渡诗人群的文集、甚至更晚的南宋中后期诸家文集。

要真正透彻地了解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熟悉了一群作家，经过比较，才能看出群体中个体的艺术个性。熟悉了一代或几代作家，才能弄清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贡献地位。总的来说，研究一个作家，最好能把他放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系上来观察、审视和评判。

比如，要准确地给辛弃疾的词进行历史定位，阐释清楚辛弃疾在唐宋词史上的贡献，就不能只读辛弃疾词，而必须将辛弃疾放在整个唐宋词史上来考察，必须研读辛弃疾以前的词人词作。明白了前人的词作在情感内涵、抒情方式上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才能弄清楚辛弃疾在哪些层面上有突破、有创造，才能弄清楚辛弃疾哪些是继承前人的，哪些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的？为此，我设计了三个层面：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并分别从这三个层面着眼阅读辛弃疾之前的唐宋词作，资料收集到位后即着手考察唐宋词的流变和辛词的艺术特质及其独创性，最后写出了一篇长文《唐宋词的流变与稼轩词的地位》。由于文章太长，难以一次刊出，于是改成两篇发表，这就是分别发表在《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和《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上的《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英

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特质及其新变》。

三、网罗法。

也可以叫“一网打尽法”，就是每读一本书，把自己需要的、有用的所有资料全部记下来或摘录出，这样可避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翻检一本书。一本书，往往包含有多种信息、资料，有多种价值。通常情况下，我们读一本书，只关注某一方面的问题，只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或资料感兴趣。比如，一本诗话或词话著作、一种野史笔记，其中既记载有诗人词人的生平事迹、趣闻轶事，也有对诗作词什的抑扬褒贬，还辑录有作品创作或传播的本事。你今天研究苏轼的生平事迹时，去查阅它，可能只注意其中苏轼生平事迹方面的资料，其他的资料就搁置一旁；明天研究苏轼的创作时又去查阅它，又只注意有关苏轼创作方面的资料；后天研究黄庭坚时，再去读它，则只注意黄庭坚的资料；过几天研究欧阳修，又只从中去寻找有关欧阳修的资料。研究十个相关的专题可能要读它十遍。这样读固然也有效果，但太浪费时间，不如在读这本诗话、词话或野史笔记时，将其中你能想到的现在或今后需要的资料一次性地全部搜罗、勾稽出来。这样，既对这本书的内容留下完整的印象，又节省时间，避免重复劳动。

用这种方法读书，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读一本书之前目的要明确，大脑里要储存一些问题，或设计一些你感兴趣备要研究的一些课题。这样，读书收集资料时才有针对性，否则你不知哪些资料是你需要的，哪些是可以暂时弃之不管的。

至于怎样把一本书中的资料“一网打尽”，有两种常用的方法：一是做卡片或笔记，摘录资料；二是做索引。我自己的藏书，摘录资料时，一般只摘录其中的关键语句，无关紧要的字句用省略号代替，以节省时间。因为写文章引用时最终要复核一遍，到复核时再把全部原文（引文）补全。凡是借阅的书，我就完整摘录，而且抄完后要认真复核一遍，看有无笔误，以免引用时再借阅复核。要特别提醒的是，初学者和刚起步的研究

生，做卡片摘录文献资料时，常常不详细注明文献出处，以致最后引用时又要从头到尾将原书翻检一遍，费时费力。文献出处，要注明到你一翻书即可查到为止。做索引，我常常做的是人名索引和主题索引。人名索引，用于生平事迹考证；主题索引，常用于其他专题的研究。

研究南渡词人群，南渡时期的诸家别集是必读的。我读这些别集，如同读《三朝北盟会编》一样，也自编多种索引。有了人名索引，要研究南渡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就可以随时检索利用。前不久我应一个刊物的约请，撰写宋南渡时期诗人邓肃的年谱，从确定选题到完稿历时一个多月。在自认为不太长的时间内能完成三万多字的考据性文章，主要得力于我以前做的种种资料索引。有了多种索引，就像自建了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调用的“活性”资料库。

一边读书一边做索引，可能会减弱阅读时的快感和乐趣，也可能使读书的感受零碎而不完整。这也有办法，可以考虑读书时只标划出要做索引的地方，待全书读完后，再一次性地做索引。我常常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读书，等到精神不太好、或者精力不太容易集中的时候再去做索引。

四、交叉法。

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要尽可能交叉阅读一些本专业之外的理论著作，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形成立体交叉型，而不是单一的直线型。阅读面如果仅仅局限在古典文学的作品和相关史料的圈子内，就很难在研究领域上有重大拓展、研究方法上有重大突破。

怎样交叉读书？我的体会是，要注意阅读对象的系列化，使所获的知识系统化、块状化。学一种理论，最好能一次性多读几种书，以便深入全面地了解掌握这门理论的体系方法。如果今天读这门理论，明天又去读那门理论，这门理论读一点，那门理论也读一点，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每种理论都只是一知半解，知识呈散点状，也就不可能融

会贯通，为我所用。要让不同的“知识面”而不是“知识点”相互交叉融会，这样才能“生长”出新的知识体系。

你的理论视野开阔之后，就会发现许多新问题、新领域，可以让传统学科中的老资料焕发新的生命活力。比如，版本目录之学的“死”材料，可以变成文学传播史和接受史的“活”材料；金石学的著作忽然之间可以变成文学传播史的资料库。我在对作家作品的地位、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时，就从版本目录学的资料中寻找大量的数据；而在研究宋代文学传播方式时，两部集大成性的金石学巨著——清人王昶的《金石萃编》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传播史料。对于理论书籍，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各种新兴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理论著作，都有兴趣涉猎，并力图将新兴的理论与传统的学术交叉融合。我喜欢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途径，总是想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我现在治学的基本路数，可以说是“两招三式”。

“两招”是既注重实证考据，也重视理论建构。简单说是考论并重或考论结合。要从事考证，就要广泛收集、发现第一手原始资料。进行理论建构时，总不能老是用一些人们用得烂熟的“大路边”上的史料。新的学术观点，需要新的资料来支撑印证。为实证研究而收集的资料，既是实证讲究的依据，也可以为理论分析奠定坚实的资料基础。也就是说，一种资料可以多次利用。而且考论并重，会不断地发现问题，会有做不完的论题。

“三式”是指“论”的方面，偏重群体观照、范式批评和定量分析。而这“三式”，是交叉阅读有关理论著作后逐步形成确定的。

群体的思维、群体的观照，是我近年来研究唐宋词史的主要思路。我坚持认为，一代文学风气的形成与转变，往往是由一代作家群共同完成的，因而研究文学史，要有群

体的观念，要注意从作家群的更迭代兴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流变过程。为此，我在《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创立了“代群分期法”，根据词人群的更迭代兴对宋词作了新的分期，重新考察描述出宋词发展演变的历程，后来在《唐宋词史论》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这方面的想法和做法（群体研究），理论上是受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学社会学的启发，实践上则直接受到傅璇琮先生有关著作的影响。群体研究，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向，至今只是对宋南渡词人群进行过全面的探讨，其他如以苏轼为代表的元祐词人群、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和宋末的江湖词人群、遗民词人群等还有待全方位的考察。

范式批评，则是我研究词史的主要方法。范式批评，是我“杜撰”的一个概念（参拙文《走向规范与科学——浅谈“范式批评”》，《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1期）。“范式”，语源学上是来源于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我所进行的“范式批评”，思维方式上也自然受到库恩有关理论的影响。我在唐宋词中总结出“花间范式”和“东坡范式”，其实也融会了接受美学和叙事学的理论方法。借鉴叙事学的方法来探索诗歌的抒情范式始终是感兴趣的课题。我常常想，叙事文学可以从理论上总结出叙事学，反过来用叙事学理论来指导叙事文学的研究，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抒情文学中总结、建构出“抒情学”理论，从而为抒情文学的研究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方法呢？我有这种念头，但力不从心，只能先从具体的范式研究入手摸索出门径。

用定量分析方法来研究唐宋词，是我近几年努力开拓的一个领域。对唐宋词进行定量分析，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问题，它包含着有关理论方法。我是从计量历史学、计量文献学中获得理论上的启示，然后结合文学社会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的有关理论，而最终摸索出一套可行的可操作的研究方案。拙著《唐宋词史论》第三章《定位论》，就是用定量分析方法所得的“实验结果”。最近我和研究生合作，又做了一些新的探索，并有新的收获，有关成果将在近期内恭请读者指教。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古代文学，前景

非常广阔，我还会继续做下去，甚至有写一部《计量文学史》的野心。